

官僚主义的弊害

LE MAL
FRANÇAIS

[法] 阿兰·佩雷菲特 (Alain Peyrefitte) / 著

孟鞠如 李直 吕彤邻 / 译

014036290

D756.5
14

官僚主义的弊害

LE MAL FRANÇAIS

[法] 阿兰·佩雷菲特 (Alain Peyrefitte) / 著

孟鞠如 李直 吕彤邻 / 译



北航

C1715795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D756.5

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僚主义的弊害 / (法) 佩雷菲特 著; 孟鞠如, 李直, 吕彤邻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060-7247-2

I. ①官… II. ①佩… ②孟… ③李… ④吕… III. ①官僚主义—政治制度—研究—法国 IV. ①D7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8467 号

Copyright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6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0716 号

官僚主义的弊害

(GUANLIAO ZHUYI DE BIHAI)

作 者: [法] 阿兰·佩雷菲特

译 者: 孟鞠如 李 直 吕彤邻

责任编辑: 徐 玲 龚 雪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4.5

字 数: 5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247-2

定 价: 6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阿兰·佩雷菲特是法国著名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学者，当过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省议员、市长；先后多次出任司法、新闻、教育等部部长，曾在政府连任司法部长；1977年被推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73年曾出版过一本《中国觉醒之时》，畅销全欧，使他享有国际盛誉。1979年10月华国锋总理访法结束时，他曾到机场送行。

本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主要是抨击法国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制和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全书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追踪隐疾”，叙述作者发现“法兰西病”的经过；第二部分论述“法兰西病”历史形成的过程；第三、四部分列举大量事例剖析法国社会种种畸形现象；第五部分分析“法兰西病”的思想根源；第六部分回顾法国三百年来种种改革尝试，分析其失败原因。最后提出几条治疗方案。

作者自己说，本书提出的一些问题，有的是没有答案的。

由于作者知识渊博，又熟谙法国政情，对许多问题揭露、剖析颇深。本书1976年出版时，曾引起法国以至整个西欧的很大

重视,被誉为“战后关于法国最重要的一本书”,揭露了法国“最触目惊心的内幕”。作者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但书中提供的大量情况,对于了解法国,并借鉴我们自己,都是有价值的。

法兰西病

法兰西呀，说真的，你的病根在哪里？

你难道不知道你为什么伤感？

我要告诉你，为了尽尽我的心，

听听我吧，你会明智一些……

可不是叫你灰心丧气。

查理·德·奥尔良^①

题赠鹿特丹市人伊拉兹马斯

探索第三条道路永远不懈，

“吉布林当他盖尔夫，盖尔夫当他吉布林”^①，

五百年来他纹风未动，古代的大师，未来的师表。

我是法兰西人,这是我的包袱。

弗明索瓦·维隆^①(1460 前后)

我知道我国的病症。

亨利四世^②(1599)

以人物自居在法国并不稀奇。

在那儿以了不起的人自居……

这就是法兰西的病症。

无聊的虚荣心是我们的特性。

西班牙人也爱虚荣,不过表现各异。

让·德·拉方丹^③

法兰西病在于夸夸其谈,爱把一切化为高谈阔论。学院维持这种作风,顽固地只讲究文彩和才情。

欧内斯特·勒南^④(1859)

我揭露一个病症,它腐蚀我们全身……无法无天,猖狂反动,二而实一。因为病在国脉,无力自治,尽管一百年来,历次试图更改政府的形式。

乔治·克里蒙梭^⑤(1913)

七颠八倒,不离老调,法国健康,十分良好,这对国家,实在不妙。唉:千百万人,听了喜报,不值一笑,反而心里,一味发毛。

乔治·伯纳诺斯^⑥(1936)

法兰西病是政治病……法国人差不多失掉了自己的政治职

能。公民没有了，怎能还有国家呢？体制里要来一次革命，根本在于群众思想起个突变。

亨利，巴黎伯爵，“法兰西病”^⑦（1954）

法国人患有沉痾。他们不肯理解，时代要求他们作绝大的努力，来适应时代……他们离不开国家，又痛恨国家，除非国难当头……他们的行为，不像成年人。

戴高乐[®]（1966）

序

我们的私生子

没有一个国家肯把自己的祸患当作亲生子女。

保罗·瓦勒里 *^①

这就是法国：它在法国儿女的心目中，有时候显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能为世界创造前途；有时候却显得衰老、消沉，往日风流无踪无影，抚今思昔，自暴自弃。如果果真壮志成灰，再无凌云之志，又何必这样伤感悲切呢？

他们是法国人：据说比任何一国的人民都难以治理。他们是造反的冠军，推翻政权的老手，打内战、制造集体祸患的纪录创造者。人还是这些人，而现在却唯官是从，唯权是爱，尽管政权老让他们失望。他们目无国家，但是没有这样一个百孔千疮的监护人，他们又没法自己活下去。

还是这个法国：在前一个世纪初，还是天下第一强国，今天

* 有助于理解的注释，均放本页底；引用的文献和典故，则编号附于书后。

却远远地落后了。最近虽然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要一面实现现代化,一面不至于失掉平衡,要就此赶上比它更富生气的国家,毕竟感到有些吃力。

思想习惯的包袱

经过多少次仔细审察,我们的困难,根子到底在哪儿呢?我自问,难道不在心理和社会学方面吗?换句话说,难道不在思想习惯方面吗?法国人面临的“问题”似乎不是由外界来的,而是法国人本身固有的,周围的现实,只不过反映了这些问题而已。

为什么英国的工业化来得比较早呢?历史和地理教科书里的答案是:“因为英国^①有煤。”为什么法国远不如人呢?“因为法国的煤矿比较贫乏。”可是,日本的工业化为什么那么快呢?还是那些,或者另外一些史地教科书却倒过来作出解释:日本人因为没有煤,只好输出制成品,用制成品来偿付进口的煤^②……

经济和民主的奇怪故障

我们今天观察世界,还用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唯物论。我们是否心满意足呢?瞧瞧加尔各答和孟买的街道吧。人们在神牛身旁乖乖地饿死,能望印度兴旺起来吗?回教徒斋戒的时候,能讲究生产效率吗?非洲一些领导人心想:当地的工人买到一把伞,一辆自行车,就满足了欲望,马上就不去上工^③,那么经济怎么能发展呢?在根深蒂固的土族和门阀社会里,西方式的代议民主制,又怎能顺利实行呢?千百年的积习,显然成了沉重的包袱。

但是,为什么单单所谓古老的社会才背有这种包袱呢?一

个社会里最虚的东西,如宗教、成见、迷信、禁忌、行为的动机、对于权力的态度、历史的作用、个人和集体的道德、受教育和教人的准则,为什么不影响一国人民的作风,不影响一种文化的发展,不影响到最基本的各个领域,如投资、生产、贸易、经济增长率等方面呢?经济是不是只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如原料、资本、劳力或生产关系的问题呢?是不是首先要有利于经济的思想习惯呢?民主制度是不是只是一个制度问题?需不需要确实能够使制度起作用的公众的思想呢?在法国,文化因素是不是导致了我们经济的落后,导致了我们的社会的困难和我们的政治危机呢?当然,这不过是原因。

因果关系,难解难分。要想找出一根线头就清理出一框线来,那将是徒劳的。历史不是一根线。别想用一个孤立的因素来说明一切。看来有必要在发展过程的多种因素中,强调指出某种因素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却正是我们那种天真的唯物论者所忽视的。这就是人的思想的重要性。认为归根结蒂还是思想最要紧,能算是错误吗?再者,我们自己最能作主的到底是什么?

布 雷 区

在安德烈·西格弗里德那儿,我在二十五年以前,便诚惶诚恐地想把我的几种设想,向他阐明一下。这些设想,读者们将在后面看到。当时,他老先生慢腾腾地对我说道:

“我的想法跟你完全一样。”(我这个浅薄的门徒听进耳朵,多么高兴啊)“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其所以运转不灵,最终的原因,还该到我们自己身上去找。不过,你得要提防,你在走进一个布雷区。群众心理的名声可不怎么样。思想习惯的研究,恰

恰受到思想习惯的限制。因为这种研究不免有点种族主义的臭味。德国的群众心理学，给人留下了不良的印象。搞这门东西，会触犯一些禁忌。人人权利平等这个概念，被人引申为人在事实上不相上下。谁要发现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差别，就怕为不平等作账本。也许这仅仅是一种谨慎的作风，不好意思在思想习惯有问题的人面前谈这个问题。”

在黑框眼镜片后面，他的眼光凝聚起来，接下去说：

“承认我们的挫折来自我们自身最深处，岂不叫人丧气和惭愧？对一个落后国家来说，要得到些安慰，就该这样去想：自己之所以贫穷落后，那是地质问题，风向问题，要不然便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其实，最先进的国家也觉得，假装相信这种说法，也是挺舒服的。”

我们法国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的虚伪，在于有时候悲天悯人，有时候自私自利。反正还是虚伪。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卫的本能吧？

他又说：“如果你到远地方去找例子也就罢了，如巴西呀，伊朗呀，等等。可是要在法国找，那你就毁了！法国人有自己的经验。他们认为自己的经验是谁也推翻不了的。他们有自己的解释，谁也没法叫他们松嘴。他们很多心。你对待法国，对待严了，他们说你是被虐狂；宽了，就说你是沙文主义。你一身兼任法官和犯人。你去对法国人谈话，他们也是这样，又是法官，又是犯人，跟你彼此彼此。一位大夫，不管他多么高明，总不肯替亲生母亲诊断。”

从此以后，我多次体会到他的警告是多么英明！一位旅客，来自远方，在公众的心目中他具有一种威望，不亚于从月球归来的太空游客。他可以侃侃而谈他的所见所闻。他谈的东西，触犯不了任何人。因为只有专家才能拿出看法。人数自然多不

了。可是，法国有五千万人，便对法国有五千万种想法，不单是想法，而且是定见。对法国人不好谈法国，就像一位善嫉的丈夫，不好谈他的夫人。政治人物的话，更没人听。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偏向。哪怕穿上学士袍，披上波斯套，那也藏不住他的派性。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说得有道理。但是，我没有听他的话。我依然顽固地去探索法兰西的秘密，好像从北坡去攀登一个高峰，因为从小就是我的梦想。

然而，我还是要请读者原谅我的大胆狂言，居然要在我们本身，要在我国社会的组织结构里，要在我们心灵深处寻找我们的真正病源。我意识得到自己的狂妄，想和法国人一道去周游一个有待发现的国家——法国人自己的国家。是呀，最熟悉的东西，老是最不认识的东西……

管 窥 症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那么一种倾向，把自己当作世界的肚脐眼。但是，这种人类中心论，又有两种相反的形式。

有时候，可惜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并且认为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并尊重这种差别。就这样，英国人往往悲天悯人地叹息，上帝为什么没有从加莱城开始加恩于人们，生下来便当英国人？这些人各有各的风俗，各有各的癖好，那就让他们去罢。

有时候，人类中心论者，会成为同化论者。比方说，库尔特·恩克尔是一位人类学家。他过一阵子就到巴西印第安人的部落里去住一个时期。每一次久别归来，老哭得热泪滚滚，伤心他别后的痛苦。因为，这个部落是他唯一值得生活的地方^④。

还有那些拉丁国家：别人吗，当然啰，没福气分享我们的文化，但是希望关系不要断绝。只要他们学我们的文化，不也就成了文明人了吗？在拉丁人看起来，别国人民的特征是不足挂齿的，而自己的特征就不用谈了。因为人是万物的主体和度量衡。劳伦斯^⑤曾写道：“法国人从这样一种学说出发（这是一种教条，而不是什么固有的本能），即人类中十全十美的只有法国人。他们觉得，外国人当然永远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只要能接近一点这个水平，就不错了。”

既然如此，那么法国人怎么能承认自己的错失，即自己失败的原因呢？我们之所以无视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自己，就因为我们不肯正视自己。这种情况，越不自觉，越起作用。有一种眼疾，眼科专家称之为“管窥症”。病人的视野极小，像从一根管子里看出去。瞧着走路还可以，要大地山河一望尽收可就不行了。弗洛伊德曾经证明，人的思想也会害“管窥症”。人在无意识中拒绝意识那些自己不肯看到的自己身上和自己周围的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知之明更加困难。自己觉察不出自己的口音，意识不到自己的口头禅，闻不出自己的气味。因为法国人的弱点深深地存在于法国人的身上，所以自己没法觉察出来。

一个国家的人民，不爱知道那些让自己失面子的真情实况，宁可推说什么浮云遮月呀，事不凑巧呀。但是，偶然久了，就变成规律。一消沉就是三百年，尽管也有几次雷电般的壮举，难道不正是这种壮举意味着衰微没落吗？法国的生命力，在十七世纪的全盛时代便开始衰落下来，而别国却正在觉醒。这样的现象，我们是不肯考虑的。要看出萎靡不振的原因何在，那我们就更加犯“管窥症”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根本不想了解自由社会的内部机制是怎样运转的。这种自由社会，在跟我们竞争的国家里，早已发扬光大，而我们呢，我们自以为也生活在这样的

社会里，甚至还自以为起着带头作用。其实，我们并没有一直真正地在社会里生活。

不自觉地回到洪水时期

今天，人们往往爱说：“前几个世纪发生的事情跟咱们有什么相干？咱们马上就到 2000 年啦。别去回顾洪水时期吧！”讨厌的是，恰恰相反，我们的理性老憧憬着自由，而我们的感性却不自觉地“回到洪水时期”。人民也罢，个人也罢，都受童年的影响。社会组织，经济活动，政治斗争，无不反映思想习惯，改造思想习惯。思想习惯的演进比什么都迟缓。

人的作风，往往在本源消失以后很久仍然继续盛行。塞古·杜尔在几内亚跟法国断交以后，继续向邻国首都订购高卢牌法国纸烟。西德人抽惯保加利亚烟，尽管两国之间隔着一重铁幕，依然没法戒掉。日本的车辆顺着左手行驶，为什么学英国，不学美国呢？日本武士在狭路上顺左手走，是为了遭到攻击时便于右手拔刀。为什么我们吃鱼用特殊的餐具？本来，鱼腥碰到刀叉会生怪味，所以在十八世纪发明了银制刀叉。可是，不锈钢虽早已解决了问题，但银制刀叉依旧风行，甚至早已过时的银制鱼刀鱼叉还在流行。工艺是流动的，习俗却是凝固的。

“我们讲的是过去”

法国人的“记忆力差”吗？记忆力差不光是法国人；即使对法国人来说，也不全对。

任何民族有意识的记忆力，都越来越差。时事新闻渐渐让位给了最后消息。最后消息又让号外撵跑。新闻的寿命，甚至

流行思想的寿命,都越来越短。现代的公民,莫不遭受新闻消息的轰炸。新闻之多,弄得他们没法辨别哪些是比较重要的。人们既感消息太多,又感消息不够。看见了近的,忽略了远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多了,人的官能便麻木了。

多数党拥护第五共和国,深信六十年代的一切困难都出自第四共和国。而在第四共和国执过政的人都起誓发咒说是第五共和国的罪孽。谁也不肯承认法国的病根可能时间久远。法国绝不是1958年诞生的*。法国的优点扎深根于古远,这是可喜的;但法国的弱点,也同样扎深根于古远,而且变成了第二天性。这是可悲的。

与有意识的记忆力相反,一个民族无意识的记忆力却好得很。历史的创伤在个人心灵深处作用十分悠久:出身好坏,农奴制,不服父权等。克伦威尔的“圆脑袋”派,越来越影响爱尔兰;美国依然带着南北战争、征服边远的西方这个神话以及奴隶制的烙印。

即使再过一百年,西班牙人还会觉得自己头上笼罩着盖尼卡·阿尔卡萨·德托勒德的内战阴影。在阴影后面,还隐隐约约出现宗教裁判所的幽灵。内战的残酷,产生于过去,而且还大大影响未来。1976年,萨尔瓦多·德·马达利亚加重到“马德里5月起义皇家学院”**讲学。这是他在国外流放四十年后回到西班牙。他叫道:“我们讲的是过去……”在他看来,佛朗哥的统治不过是一个插曲。他用的话是路易·德·莱翁的名言。莱翁被宗教裁判所逐出教育界,过了很多年重新讲学。这句话是他向学生们讲学时讲的。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两个西班牙

* 1958年,戴高乐上台,建立第五共和国。——译者

** 纪念1808年5月2日,马德里居民起义反对法军。